

经典战史回眸 抗战系列

赣北兵燹

南昌会战

谭飞程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经典战史回眸 抗战系列

赣北兵燹

南昌会战

谭飞程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赣北兵燹:南昌会战/谭飞程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1
经典战史回眸·抗战系列

ISBN 978-7-307-12114-0

I. 赣… II. 谭… III. 国民党军—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史料—
江西省 IV. K265.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4093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5.25 字数: 478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114-0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自序：我与抗战	001
第1章 武汉会战之后的抗战局面	010
第2章 中日军事大调整	031
第3章 日军：目标南昌	045
第4章 中国军队：攻与防的矛盾	066
第5章 牵制	080
第6章 序战吴城	094
第7章 修水毒烟	109
第8章 烈焰涂家埠	125
第9章 箬溪助攻	138
第10章 长蛇破	154
第11章 致命一击	178
第12章 大崩盘	196
第13章 武宁不宁	213
第14章 名城陷落	230
第15章 进攻余绪	246
第16章 高安狼烟	260
第17章 喋血庐山	275
第18章 西线攻势	289
第19章 东线袭击	307
第20章 大江北去	322
第21章 余恨绵绵	341
第22章 会战评价	359
参考书目	384
鸣谢	397

自序：我与抗战

写完这本《南昌会战》的初稿，我已经虚龄36岁了，这搁在中国古代，是可以自称“老夫”的年纪了。就是按照旧有的老中青三代的划分，也是中年人了。在30多年的生涯里，从听闻抗战、了解抗战到书写抗战，有许多经历与感悟，在此与广大书迷分享。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但从小由外公、外婆两位军人带大，所以从小就对军事十分着迷。我与抗战的结缘是在1987年，那一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神圣抗战》一书；电影《屠城血证》也上映了。当时虚龄10岁的我被《神圣抗战》中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所吸引，而《屠城血证》使我直观地了解了“日本鬼子”的凶残。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神圣抗战》中，除了戴安澜将军的那篇以外，就没有涉及1938年以后的正面战场了，只是用了一段话概括，这让我疑窦丛生，产生了了解那段历史的想法。

之后，我的阅读逐渐开阔。1994年，中考前的我买了张晓然先生的《八千男儿血》（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看了之后心境久久不能平静。我有了一个念头，

想收集国民党抗战牺牲的将领，记录其姓名、军衔、职务、教育、籍贯、出生时间、字号、牺牲时间地点等，做成一张表格。不久，我有幸买到了党德信、杨玉文两位先生的《国民党抗战骁将·炎黄忠魂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于是抛开以前零星的收集，以此为基础，补充成一张表，并记录在硬面抄之上，取名“炎黄忠魂谱”。到高三时，重新誊录，并在硬面抄的扉页题上了《我的中国心》歌词以明志。随着阅读的增多，我又开始做校级军官的版本，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稿。2002年，我把整理的100多名（后增至126名）将军名单贴在了音速论坛，被诸多转载。以今日之眼光，此表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自己已经没力量修改，倒是好友胡博潜心钻研国军人物，在微博连载抗战殉国将领，并与王戡一起推出了《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军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成为此领域集大成之作，殊堪推荐。

高二时正逢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校组织了全校抗战故事演讲比赛，我也报了

名。我的演讲即以《八千男儿血》的内容为本，浓缩成一段常德保卫战的故事。演讲那天，在20名演讲者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讲正面战场的故事——他讲的是课本上就有的台儿庄。抽签时我抽到的是2号，第一位同学讲平型关声音如同蚊子叫，而且故事又特冗长，超过规定时间。所以，他一讲完我就几乎是飞奔着上台，然后以洪亮的声音一口气讲述了自己准备的故事。事后同学评述，说我讲得太快，连喘气都不带，没有给听众缓冲的时间。最终我什么奖也没得，但我觉得那天是最畅快的一天。

在看抗战书籍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书对中国军队方面的介绍是详细的，而对日军确总是含糊不清。我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念头，以后要注意日军材料的收集。然而，那时的我不可能接触日文材料，这个念头只能暂时保留了。2001年，我在大学图书馆自修时，偶然发现了李惠、李昌华、岳思平三位先生编著的《侵华日军序列沿革》（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爱不释手。为了省钱，我在图书馆泡了几天，把整本书抄录在一本小册子上。至今，这本小册子仍在，只是有一次沾了水，用纯蓝墨水写的字漫漶了好几页。

人的求知欲总是无穷的，在看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我又不满足了，期望能接触真正的日文材料。就在那一年，我在音速论坛认识了侨居日本的章骞先生。我们在上海一见如故，章骞先生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

还赠送我人生的第一本日文书《日中战争》（三野正洋，光人社）。由此，我开始着手《侵华日军序列变迁总表》的编订。工作以后，我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随之日文材料也逐渐多了起来，但俗务也更加繁忙，且极欲成就定鼎完备之作，以至于该书的体例就修改了数次，至今尚未成稿。

2002年，我踏进了和平论坛，这是个专门研究民国的BBS。在这里，我认识了一大批朋友，还写了生平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抗战文章《衡阳保卫战系列之衡阳机场争夺战》（未刊稿）。当时是想抽取衡阳保卫战中数个经典战斗，写成一个系列文章，但因俗事纠葛，未能继续。后来，这个论坛改版为立雪社（论坛）与征程忆事（网站），大家在立雪社讨论，成稿的文字发布在征程忆事。近些年活跃在民国和抗战写作一线的大多数草根研究者，如胡博、王戡、冯杰、牛戈、蔡朋岑、马雷、高明辉、霍安治、钟子麟、黄勇、周明、周强等都是出身于此。2008年，网站遇到资金困难，主持者因先前一直受大家捐助，不忍再告难众人，不得不关闭。至今想来，甚为可惜。

2003年，我进了人生第一家单位，是个军事刊物编辑部。我本以为可以发挥我对抗战的了解，但单位却要求我将注意力放在太平洋战场。到2005年，考虑到抗战胜利60周年，单位重点组织策划了一个台儿庄战役的军史专题。专题这期一出，从销售商那里反馈的消息却是灾难性的，他们纷纷表示

销售很困难。后来，我们又做了一期第三次长沙抗战的专题，销售商们几乎要造反了，说如果再出抗战的专题，他们就不卖了。面对市场冰冷的反应，我们只能屈从。以至于到2007年，单位与上海某出版社合作，准备精选历年文章出专题文集，起初策划了抗战的内容，可是缺乏足够的文章而作罢。其间2006年，我加入了一个草根中国历史研究QQ群，这个群里清一色的七字昵称。这就是如今微博上所谓七字党最早的源出。这里的人士对于中国古代史各自有一块自留地，见解也颇有见地，但唯独谈到抗战史，对正面战场诸多贬低。每每争论，则都是我一人舌战群儒。不过日子久了，他们看我言必有据，便相互求同存异、和光同尘了。

2008年起，我有了一段短暂的自由时光，开始钻研魏晋南北朝这一块，并希冀有所建树，抗战便又放下了。只是把一篇2003年就开始写，答应给朋友的南阳保卫战仓促完稿。2009年初，有朋友找到我，说正在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合作出抗战系列的书，希望我能参与。他提供了三个选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我当即选择了武汉会战。因为我在高中时，读过陈道阔先生的《长河落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深深为之倾倒。高三时，我又根据数本材料，与同学一起做了个武汉会战的图上兵棋推演。我自以为对武汉会战还算了解。然而，当真正开始创作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幼稚。武汉会战场面之大，各个小战斗

之繁复超乎自己的想象，加上长期疏远抗战，资料储备不足，一时陷入困境。幸得好友胡博倾囊相助，他将自己的资料库开放，随我取用，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资料到手了，然而困难也接踵而至。国人记载历史以意为先，所以战史及回忆资料大多信息模糊，矛盾重重，导致诸多情节迷蒙不清，断非短期可以厘清，不得不再三妥协，小部分考证，大部分回避。最后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搜罗资料，三个月时间全脱产闭门造车，终于勉强完成了此书。写书时，从早晨一睁眼就开始写，一直写到深夜一点多，当中只有吃饭上卫生间可以休息片刻。特别感到难受的是，每天的情绪也随着书稿的内容起伏。抗战之中国以一个落后的躯体与凶残先进的侵略者对抗，情势之险恶艰难，牺牲之悲壮惨重，让人痛苦不堪。书稿写成后，仍然持续数月处于抑郁之中。2010年书稿付梓，稍得宽慰。其后幸蒙近代史史料学会秘书长李永璞教授青眼，因此书忝入学会，总算多日辛苦有所报偿。

《鏖兵江汉——武汉会战》完成后的2009年秋，我从上海搬到了杭州。因为生活和环境的变故，几乎无法继续写作，于是心生退意。2012年，当武汉大学出版社的王军风编辑再度向我约稿时，我陷入了矛盾境地。这两年的微博兴起，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形成一种独特的媒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批所谓“公知”红口白牙造谣惑众，以民国时代为尧舜之治，以苦难

抗战为燕然之功，以个别人物为孙吴再世，为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造势；一批所谓“自干五”又以讨伐公知为名，一味讥讽正面抗战，嘲笑当时中国的困境，用钓鱼这种无耻无底线之行径娱乐大众。我以为出现对历史细节的争论和歧见是正常的，但像眼下这样的认知对立乱象是极不正常的。在如此乱象之下，我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于是，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接受新的书稿任务。

这次编辑是让我自报选题，我则选择了南昌会战。因为南昌会战是武汉会战之后的第一次会战，从某个角度而言，可视为武汉的续章。然而南昌会战并不好写，其一，南昌规模较武汉为小，而要达到同等篇幅需更多材料。其二，自搬迁杭州之后，资料分隔上海和杭州两地，经常需要来回奔波，特别不方便。其三，写武汉时是脱产状态独自在家写作，而本次是边上班边写，而且住处并非一人，往往要等夜深人静才能提笔。令人欣喜的是，本次写作得到更广泛的帮助，无论同事、朋友、军迷皆慷慨相助，比如好友胡博，请教问题随电随查随答，当场解决；冯杰不收快递费将收藏的罗卓英将军纪念集快递过来；李异将珍藏的《抗日战史·南昌会战》翻拍发来……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我笼统地附记在后面，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有不敬之处，还请各位宽谅。

本次创作的程序大体与《武汉会战》一书无二，先搜罗资料，再具体写稿。最大的不同，是《武汉会战》一书是从头至尾铺陈

而就，而本书却是大多数章节独立写，最后统稿。特别是最初六个章节，是同时开工，齐头并进，又分别完工的。第一章恰恰是全文最后完工的一个章节。这是因为在见缝插针的写作条件下，为保证进展速度而采取的临时对策而已。

正因为写作条件不佳，我一度曾想放弃。那段时间，某关爱抗战老兵组织的人士延请我加入他们，我想这是好事便加入了。一次我看到同组织的人在谈抗战时，把一·二八和八一三搞混了，便客客气气地提了出来。可是我没想到，这一句话便捅了马蜂窝。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据说还是抗战老兵后人）带着一群人（其中包括大学生志愿者）极尽冷嘲热讽，总结起来一句话“别人也有错，所以我们有错是正常的，你看见了错不能装哑巴吗？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指出来？”同时，亦有相熟的抗战研究人士与其他关爱抗战老兵组织合作，对所谓“良心认定”模式而不是“事实认定”的方式提出质疑，劝对方慎重，同样遭到群起批判。连关爱抗战老兵组织的人士都是这么个态度对待历史，更何况普通人呢？于是，我重新全力投入。

本书在内容上比《武汉会战》一书有所提高，大幅增加了日军部队史和个人回忆录的材料，今昔地名对比更加完善，中国军队人物采用系统的职衔标注，并修正了《武汉会战》一书中对中日个别人物介绍中的错误。所以，如果有读者发现不一致的地方，

以本书为准。此外，如果说《武汉会战》的精华是第17章，那么本书的精华恰恰是第1章。因为除了南昌会战本身的叙述之外，我想突出反映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抗战形势，对这种大势的认识是草根研究者和普通军迷容易忽视或了解不透的。对此，我想突出传达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西方政治形势与中国战场形势的关系。这在一般抗战书籍中总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实在欧洲发生的每一步都牵动东亚的神经，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是有关中日和局。自民国时期以来，为汪精卫“曲线救国”翻案的声音就没有断绝过，就是在本书写作期间，有那么几个微博名人打着人民的旗号轮番哀嚎，从最初认为和局可成到干脆为投降鼓噪。其实从现有资料便可以判断，在和谈中握有主导权的日本方面根本无明确的战略、无稳定的政策、无合理的底线，有的只是贪婪的心态、空洞的说辞和变幻不定的谈判条件，根本无和局之可能。退一步说，低调俱乐部诸人在与日本和谈之初，因对中国内情的了解，放大中国的困难忽视日本的困局，对抗战形势产生误判，还可以说当局者迷。那么重光堂会谈一波数折之后，面对明显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条件，还要往里跳，那就是汉奸无疑了。而后人，尤其是某些史学专业人士（尽管非近代史专业），面对如此清晰的历史事实，还要信口雌黄，比之汪、周之流是更加可恶了。限于本书主题，篇幅有所限制，文中对以上两项仅提供浅显说明，未作

充分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依据这些线索，作深入探索。

大约有了前次的经验，这次写稿虽然也感到愤懑压抑，但是没有那么剧烈。同时，无数中国军人的前仆后继并没有让我特别感动，因为军人保家卫国是其职责，真正触动我的却是平民百姓。当我发现1938、1939、1940年华侨侨汇大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情况，止不住泪流满面。这是我写这本书稿唯一一次哭泣。另外，大大触动我的还有钱塘江上牺牲的三位无名船工和为敌后游击的新编第11师找粮食的老太太和残疾退伍老兵。尤其前者，他们做那样的事情，纯粹是出于一种最朴素的情感。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值得永远纪念的英雄。

经过11个月的磨砺，在这本书稿初成的时刻，我总算感到一丝欣慰。回看抗战的写作，武汉一书自己的投入与稿费持平，而本书仅购买资料的开支已经大于稿费许多，如此写书求的是什么？我以为我们70后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还是比较传统，观念也比较传统，要做事就是踏踏实实一定要做点成果出来而不是游戏人生，要写历史就写成信史而非纪实、戏说之类。当然时代确实不同了，想要做太史公、班兰台是做不成了，但是齐太史一家的精神是我们需要秉持的。所以两本书（除《武汉会战》第12章），我都坚持事实叙述，自己不了解清楚的事情不写，缺乏事实依据的事情不写，不作过度解读。在此，我不得不谈一谈关于抗战资

料，特别是正面战场资料的使用问题。正面战场资料大体上有这么几类：一是各类原始档案，包括档案馆藏档案、电报、战报等等；一是当时的出版物；一是大陆的文史资料和台湾的传记文学、回忆文献；一是各类自行出版的回忆录或自由采访的老兵口述材料。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这些资料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就第一类而言，一般档案文件只代表文字上的意义，是否执行下去，到什么程度都值得探讨。电报、战报受主观影响很大，记载的事实有多少是真，多少是虚夸或者又隐瞒了多少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此不客气地说一句，当时中国军队几乎所有电报、战报的统计数据都不太可信，从写原件之人落笔之时开始就存在夸大或缩水等现象。特别是歼敌数目，如没有日方资料的协助佐证，可直接丢弃不用。另外，当时的出版物出于宣传或论战目的，使用需要谨慎。大陆的文史资料和台湾的传记文学、回忆文献均同样带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在叙事上有时代政治性色彩，不可轻易尽信。最后一类材料受记忆力、资料、个人性格和出版、述说目的的影响，其诚信度更是只有天知道了，只可作有限参考。总之对材料的如何适当运用，去伪存真方面，抗战史研究的难度要比许多近现代战争史研究更高，这也是抗战史研究最艰巨最困难的所在。不慎者很可能因为一个微小的失误，造成全文甚至研究体系的崩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尽管使用材料万分谨慎，然而考虑到两书是商业写作，是以通俗的方式将已有的专业信息传达给广大军迷爱好者，并非真正意义的纯军事领域的战史，所以在不妨碍事实的情况下，我对文字进行适当的文学语言修饰，避免行文过于枯燥。众口难调，不当之处还请广大读者海涵。

当然，本书存在诸多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是因为本人不熟悉制图软件，又无力承担商业图片制作成本，所以放弃了数十张作战地图。这些地图并非现有地图的简单复制，而是计划在现有地图基础上相互结合、相互考订的产物，以再现当时各主要战斗的态势。只能期待今后条件成熟时再补充了。

尽管本书是按事实叙述的标准所写，但我不敢说我自己了解的抗战就是抗战的全部真相，我对抗战所持的观点就是唯一真理，因为就如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眼里有自己的抗战印象，只期望自己的书是进入那段历史大门的敲门砖。我特别希望每位读者不要预设立场看书，因为一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他对历史的认知。这一点绝不是多看几本历史书，就能改变的。为什么这么说？我曾将书稿中唯一令我落泪的段落写在微博里，结果立即有一位自称是民国财政专业研究者的人以此讥笑当时的中国政府，他罗列了一组数据，甚至提出民国财政达不到侨汇数十倍，抗战第一年财政损失如此严重，所以他就要喷。可以这

么说，这位“专业”研究者的数据或有所出典，但他完全忘记了，所谓历史研究的客观不仅是要针对数据、事件，还要针对其历史条件，跳出历史条件来进行评判必然得出极端主观的结论。抗战之艰难困苦，战相丑陋是事实，但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整体的落后，这种落后也不是以当时的条件，在一朝一夕之内就能改变的，不能将此责任完全归结到某一个政府某一个党或某一个人头上（详见拙作《鏖兵江汉——武汉会战》第17章）。我们可以批判，但不可以因为失望，就占据道德制高点，为喷而喷，尽行讽刺之能事。从另一面而言，民国的人与事存在时代局限，人无完人，事无完事，不可揪住一点，过分拔高，夸张粉饰，仿佛民国时代人人是英雄豪杰，举国是人间天堂。这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我还想劝说许多对抗战有兴趣的年轻人，不要因为少数极端解读者和钓鱼爱好者，就卷入反对而反对的无谓口水战之中，在微博上成天浪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发泄和打嘴仗是成本最低的胡闹，起哄和看热闹是最廉价无聊的娱乐。抗战之中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地方还很多，哪怕是草根群体也有着广泛的做学问的空间，并不是无所事事。如果能将不满转化成研究的动力，能将口舌之争变成脚踏实地地做实事，不以“与人斗”为乐事，则中国之幸、历史之幸、抗战之幸！

谈到抗战的研究和探索，我便想说说对

于抗战军事史的看法。我最初给杂志写稿是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查阅资料时发现了日本防卫厅有102卷本的《戦史叢書》，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分别有15卷本的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和5卷本的History of U.S.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均是体量极大，全景又有相当细节，并从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对手资料的纯军事战史著作。而放眼抗战，可以这么说，迄今为止国内尚无完整详备的，中日双方资料充分运用的纯抗战军事史著作（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巨著官版战史，很大程度上只是国军战报的剪辑）。尤其日美这些著作成稿比较早，对对手资料运用还有缺憾，而中国之抗战，近年来各种资料几乎可谓完备，为何没有相应成果呢？究其原因，国人总是对政治、战略比较敏感，关注历史规律性、制度性的东西，在这些方面叙述得比较详尽、透彻，然而对战役详细经过则比较忽视。缺乏对战役细节的精确研究，必然使得观点的正确性大打折扣。所以，个人认为，要写这样一部著作，必须首先对抗战大的会战和游击战中具规模的战斗有深入的研究，最好能对其中一半以上都写过著作或大体量的战史文章，最后在这个基础上作统合。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有志且有能之人，甚至是一个团体的努力。这是梦中呓语，抑或能得实现，吾与诸君拭目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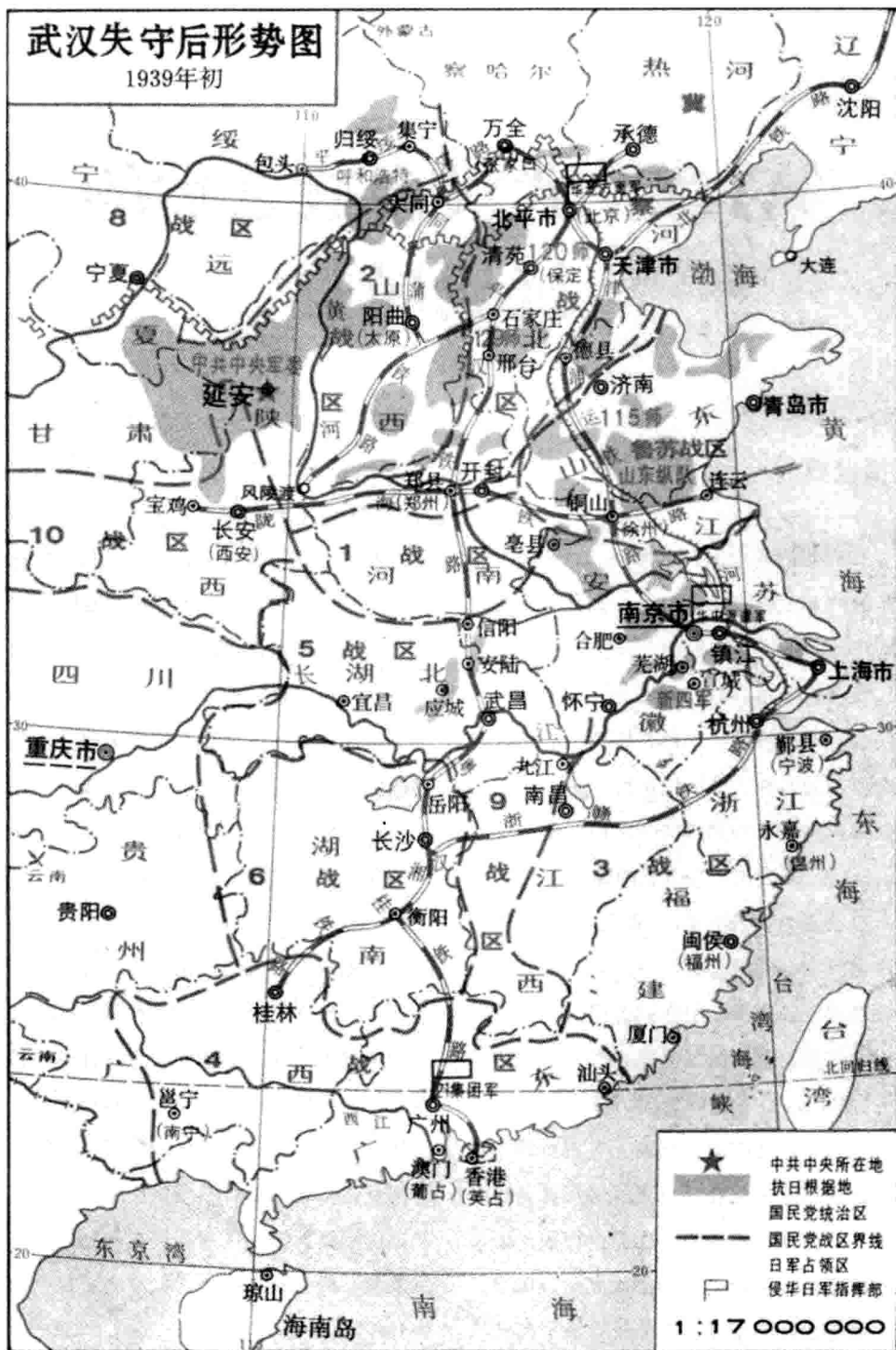
话又说回来，我个人作为一个长期断断

续探索抗战的草根，在知识上未能充分厚积，材料的搜罗亦未穷尽，会战规模的写作又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无论整体把握，还是

具体细节都不甚完备，况且成稿时间仓促，难免存在错误，欢迎广大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谭飞程

2013年9月9日于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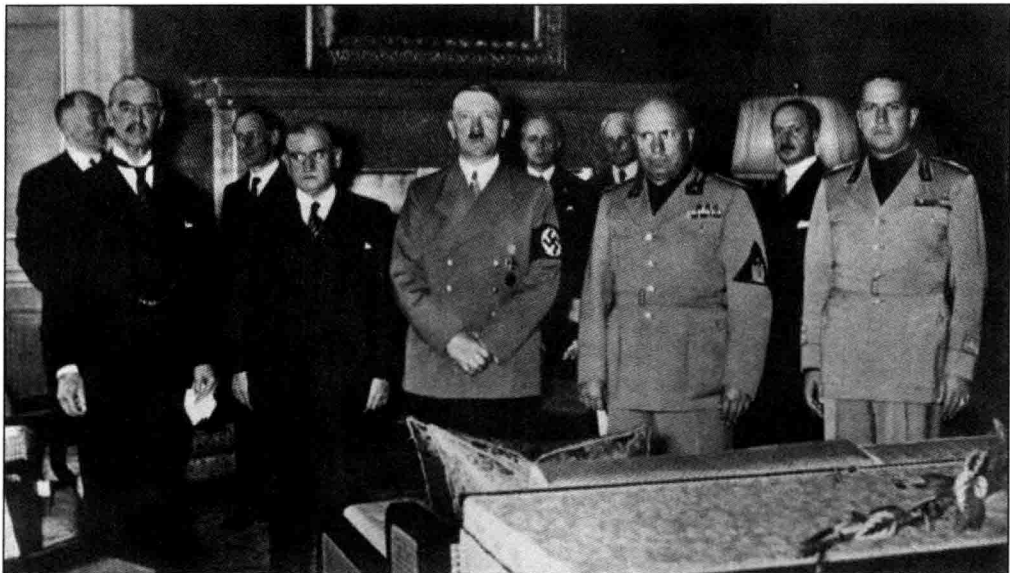
第1章 武汉会战之后的 抗战局面

诡谲世界

1938年底的中国，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肆意侵略：10月21日，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广州陷落；25-27日，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汉三镇陷落；到11月中旬，空前规模的武汉会战落下帷幕。从此，中国抗战转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此时的国际局势，亦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列强势力在面对中国抗战新局面时，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嘴脸。

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帝国主义，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记忆以及自身力量衰弱而调整战略的需要，对东西方新兴列强采取了绥靖政策。就在武汉会战进行期间的1938年9月29日，为了安抚德国，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与德国元首希特勒、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强迫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接受。这一协定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看清了英法软

弱妥协的本质，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胃口，使得他们汲汲营营于实现“东方慕尼黑”。对于日本侵华的事实，英法依然流于一年前布鲁塞尔会议时的口头谴责，虽然未曾彻底断绝对中国的援助，但是不仅援助杯水车薪，而且还制造诸多阻碍，附加诸如停止与苏联合作抗日这样的政治条件。英国关闭了香港进入广东的援助转运通道，将重点转移至缅甸通道。同时在物资通过上设置过境税与时间限制，甚至还临时关闭通道，使得1939年全年运输量仅及香港通道1938年10个月的3%还不到。这固然受限于运输条件，但人为阻碍才是主因。法国也一样，在印度支那拖延援华物资的交付，甚至直接指示不准援华物资过境。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并继续在南海扩张，这对英法有了一定触动。3月，中英双方签署《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英国试图帮助中国维持法币的币值。法国则对印度支那过境物资放宽限制，降低过境税，并同意为叙昆铁路提供4.8亿法郎贷款。



■ 慕尼黑协定签字前的与会首脑，自左及右分别为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和齐亚诺。

美国作为后起之秀、太平洋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继续扮演着双重友人的角色。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他们是一心要把外国势力和外国贸易全部逐出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市场、日本经济和工业独霸的基地的”，但是又不愿意看见使用经济制裁导致战争后果。美国既希望通过怀柔政策使日本能保证在中国实施门户开放，确保美国在华利益，避免全面与德意结盟，又希望“非正式地做辅以官方承认”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限制日本的扩张。美国一面继续向日本大量出口汽油、煤油、钢铁、铜等战略物资，同时又援引中立法案明确禁止军火商向中日输出军火以及在美国发售公债。美国对于中国政府也提供一定的实质性援助。1938年12月，反对孤立主义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

索宣布延长1937年7月9日中美签订的《金银协定》，以支持中国法币币值的稳定。1939年2月8日，《中美第一次桐油借款合同》签署，由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和纽约世界贸易公司出面，分5年购买中国桐油22万吨，美方给予最高限额2500万美元贷款，利息4厘半，以购买美国农工产品。桐油在美国销售净收入的50%用于偿还贷款，另50%扣除相关费用之后，仍用以购买美国农工产品。这一借款方式后来被多次应用。

德意作为意欲重塑世界秩序的轴心国势力，逐渐体现出间接帮凶的作用。尤其是德国在欧洲连续吞并奥地利、苏台德区，进而在1939年3月吞并了整个捷克，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以欧洲为政治和利益核心的列强们将大部分精力投入



■ 成批的苦力正在将桐油从仓库中搬运至车站。这些桐油将出口美国，换来维持抗战所需的物资。

在德国身上，使得日本在亚洲有了活动的空间。但是德国同样也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境地，他既想拉拢日本加入德意同盟，又不想失去中国。随着中日战争的深入，德国也必须做出选择，由于德国在欧洲采取积极扩张的政策，德国需要日本在亚洲牵制苏联，所以中国就成为牺牲品。武汉会战期间，在德国政府的严令下，德国军事顾问陆续回国。相关军火和军需品贸易的谈判也逐渐停止，到1938年底1939年初，中德关系冷却到了冰点。

意大利作为德国的跟班，自身实力有限，在亚洲的利益也有限，又极力拉拢日本加入同盟，因此在抗战爆发后不久便停止了在中国的合作和援助。1938年底1939年初，

墨索里尼主要关注西班牙的进展、与德国协力对抗英法以及日本入盟的问题，表现出对日本拖延的不满，甚至想干脆排斥日本。不过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与中国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的代表团团长顾维钧会谈时，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劝中国直接与日本商谈达成协议，“不要依赖民主国家并非无私的承诺的帮助”；一是欧战必将爆发，中国的问题届时将得到彻底解决。

苏联的角色其实颇为尴尬。苏联政府清醒地看到“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的事件在整个欧洲造成战争狂热”，同时其设想的集体安全政策无人响应，独立对抗轴心势力又没有足够的胜算，而且需要面对东西夹击

的风险，所以，苏联形成了对德直接和解，对日间接牵制的外交策略。关于后者，利用中国抗战长期牵制和消耗日本即成为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就这一点而言，尽管苏联是被迫的，是以中国之盾磨损日本之矛，使之无法威胁苏联，但在当时却是唯一几无顾忌，全面且全力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也是当时中国唯一“靠谱”的盟友。这种援助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道义方面，与诸列强始终羞羞答答不肯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不同，以言语直率刻薄闻名国际外交界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真名马克思·瓦拉赫）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发表“从中国的观点看来很精彩的演说”（顾维钧语），直陈日本是侵略行径，批评西方软弱。同时，苏联在国联组织中强烈支持对日本实行集体制裁，并作为第三方积极帮助中方转达有利中方的草案。其二是在物质援助方面。与英法的刁难拖延不同，西北与苏联之间的交通线成为援华物资主力输入线，有5000多辆苏联卡车连同其司机、译员奔波在这条交通线上。另外，苏联船只还自黑海敖德萨出发，突破海上封锁，将物资运送到香港。在武汉会战后，随着日军对中国封锁的日渐严密，西北运输线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大批武器、弹药“堂而皇之”地运送进中国，投入抗日第一线，成为最稳定的抗战“输血管”。

就世界范围而言，大部分国家政府对中国的抗战抱同情态度，但自顾尚且不暇，因此

缺乏实质性的帮助。而各国各种政治组织与民间组织对中国支援如火如荼，如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印度、南非、澳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抵制日货的活动，导致这些地方日货输入减少。在欧美亚许多国家，出现了民间的募捐和罢工停运出口日本的军需物资，有力地声援了中国的抗战。

苦难中国

经过第一阶段抗战，中国军民顶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打破了“三个月灭亡中国”和占领武汉迫使中国屈服的迷梦，拉开了新的抗战阶段的序幕。尽管中国没有亡，抗战的旗帜没有倒，但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争形势依旧艰难，甚至不容乐观。

首先，中国固然以空间换时间，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将日军拖入了战争泥沼，但空间的损失也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

一是最大的两个商埠——上海和天津丢了；经济最发达的京沪一带丢了；商品粮食的主要产区——长江三角洲、江西、湖广，前一个丢了，江西被侵入，湖广损失了几乎一半，剩下的也遭到威胁；盐的主要产区长芦、山东、两淮均沦陷，两浙、福建、广东也部分沦陷。由于经济遭到摧残，而军事开支直线上升，中国财政已经形同破产——193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2.97亿元，支出却达到11.69亿元，赤字高达令人